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王元化
文学评论选

12067/10

I206.7/50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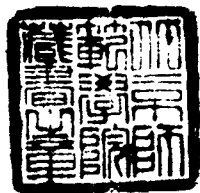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1767



湖南人民出版社

901767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陈望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1,000 印张：6.125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9·1523 定价：(平装)0.70元
(简装)0.83元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255/30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三十二年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

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

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前言	(1)
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	(6)
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	(18)
文学和真实的思考	(29)
论题外发言	(45)
用光明暴露黑暗	(51)
反对“无巧不成书”的“巧”	(55)
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59)
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	(67)
将人提高一解	(82)
模仿·作风·风格	
——《文学风论译本跋》	(90)
论知性的分析方法	(96)
看戏偶记	(104)
影片《天云山传奇》点滴谈	(126)
契诃夫和我们	(130)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今天	(141)
别林斯基围绕果戈理的战斗	(154)
黑格尔《美学》札记三则	(166)

前 言

在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只能从自己有限的文章里选出本集所收的十来篇文字奉献给读者。我在青年时期也有过奢望，希望能在写作方面作出较多一点成绩。但是事与愿违。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懈怠，白白荒废了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时光；另方面也出于环境所限，有较长一段时间，我被夺去了作为一名写作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一首七律送给一位和我共遭磨难如今已故的友人，借以抒吐当时的抑悒情怀。我从来没有做过诗，今后大概也不会再做了。其中有两句是：

豪情都作断肠梦， 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 问君更得几时还？

我不想为自己掩饰，这是由于渴望工作却不能工作而流露出来的一种颓唐情绪，自然不足为训。当时我没有料到，在今天确立了正确路线的党的领导下，为害甚久的极左思潮随着横行一时的“四人帮”的覆灭，终于遭到人民的唾弃。我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本拙著的后记中，曾用下面的文字来表达我的欢欣：“……可以深深领会到目前正在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

是具有怎样巨大的力量，它给我的最大鼓舞，就是那标志着理性再觉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已经发出了新的呼唤。”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可能出现类似经济领域内由于生产力摆脱了束缚从而取得蓬勃发展的情况，那么，自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确实象把农村经济搞活一样，也把文艺搞活了，使之在经历十年浩劫已被窒息被闷死的情况下得以复苏，并且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这是黑夜之后的黎明曙光，宛如在广阔的天空突放异采。我以为，从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从没有象近几年这样给人以抚慰，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希望。自然，这并不是说文艺战线没有缺点，这是必须警惕的。也有在开放政策下，随着好的一面同时出现的一些引进上的偏差；或盲目地迷恋西方，甚至少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某些现象。不过对于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区别，加以分析，而不能笼统地绳之一律，更不能简单的嗤之以鼻。譬如治水，不能用鰐的防堵，而应采取禹的疏导。只有循循善诱才能使那些迷失在黑暗中的星球重新返回到正常进行的轨道上来。看到缺点当然是应该的，但决不可以瑕掩瑜，抹煞这几年来由于解放文艺生产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我个人这一小小侧面来说，尽管近几年我的身体日见衰弱，而且只能挤出一点业余时间来从事写作，但我写的东西就数字上说已超过“四人帮”粉碎前那许多岁月。据我所知，别人的情况更为显著。本集所收文字约四分之三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其中仅《论题外发言》等六篇（其余详篇末写作日期）选自一九五二年印行的拙著《向着真实》、（另一篇《看戏偶记》写于五十年代而从未编入集内）。其余的文字则都是这几年中写成的。在编这本选集时，我除了作些文字上的修订，并

没有改动内容。因为它们留下了我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痕迹。我不赞成章太炎晚年手定文集时一再刊落删定的办法。他这样做正如鲁迅指出是为了“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还是让它现出什么样子的好。我相信读者的辨别力，倘有毛病，他们迟早总会看出来的。

这本集子是遵照“中国当代文艺评论丛书”主编冯牧、刘锡诚、阎纲同志的嘱咐编选的。时间限于当代，解放前的不收；性质限于评论方面，纯理论性的不收。在后一点上，可能我的编选有点违例，因为我把一篇《黑格尔美学札记三则》收入集内。关于这方面，我有自己的一点看法。我是主张综合研究法的。我认为文艺评论和文艺基础理论以至美学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很难完全割开来。我很同意一位作家朋友和我谈到的意见，他认为文艺评论应以美学为基础，否则就很难把道理说透。由于我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涉及到上述那篇美学论文中的某些论点，为了使读者以明究竟，也收入集内，这样可以使我的论点比较清楚，对全套丛书的体例我看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想丛书的主编和读者可以体谅这种苦衷。另一篇《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虽未直接涉及当代文学，但却是从当代文学现象考虑出发提出来的文艺理论问题。所以也不能说因为未举当代文学的实例，就划在线外。自我提出这一问题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探讨同一问题的文章，因此也可以说它应作为当代文学中将会影响作家创作的一个问题而值得注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对于当代文学作品没有写出什么专题文章，虽然不少作品曾使我深受感动，有的甚至使我不禁泪下。请想想看，在十年浩劫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残暴、冷酷，人的尊严被践踏，赤裸裸的兽性发泄……一旦大地春回，从这些作品

中领略到了生活的温暖，看到了人的真诚、善良和正直，我是多么感动啊，几乎无法自抑！对于这些在我心中增添了光和热的作家，我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使我加强了从青少年时代起党对我所培育的追求真理的信念。也许我有一种偏见，我比较偏爱那些不是凭着小聪明卖弄才情而是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并加以真实表现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纵使被人（很可怀疑地）指摘为缺乏技巧，我还是要说它们在艺术的成就上决不在那些用新异的形式和绚烂的词藻装饰起来企图出奇制胜的作品之下。在文艺评论方面，我喜欢读上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一年一篇的《概观》。这样的评论文章把作品的研究和文艺基础理论、美学结合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做，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希望能多读到一些这样的文章。本集所收文字在针对某些文艺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时，虽然也涉及当代作家作品问题，但作为专题来探讨的仅有一篇《影片〈天云山传奇〉点滴谈》，而且还是座谈发言纪要。我本来还想把另一篇关于《祸起萧墙》的座谈发言纪要也收入集内，可是由于当时整理好的记录拖延未发，而且连记录稿也遗失了。为了弥补这一阙漏，现把去年《文艺报》发表的《文讯》中记者所记我在上海作协召开《祸起萧墙》讨论会上的发言摘录如下：

王元化说，他读这部作品时，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一种崭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这就是革新的力量、前进的力量、党和人民的力量。他认为，随着四化建设的前进，这样的斗争将越来越深入，其表现形态也将越来越复杂，这将是我们的文学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应该加以深刻反映的社会矛盾。

末了，我要对几年来不断给我帮助和鼓励的前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

以此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力量。也有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给我写来热情的信，他们掏出心里话向我倾吐，使我的心和他们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少年时读到的鲁迅在《热风》中所译的有岛武郎《与幼者》。这篇率真的文章有几句话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现在我把它抄下来作为自己的铭箴。那就是其中对幼者说的：

“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地拿我做一個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

王元化

记于黄山人字瀑下听涛居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

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

一、要重视文艺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实用主义猖獗，因此对基础理论全盘否定。当时周培原同志就提出在自然科学中只搞应用科学，否定基础理论会造成不良后果。但是这个切中时弊的正确意见，受到了“四人帮”的打击。粉碎“四人帮”后有所扭转，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文艺理论方面同样有这个问题。我认为放弃基础理论的研究，文艺评论中的一些问题就会永远纠缠不清。

我在抗战前开始接触进步文艺理论，最初读到的文艺理论入门书是维诺格拉多夫写的以群译的《新文学教程》。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出版的文艺概论，比较有影响的又是以群在“文革”前主编、现在重新修订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从那时到现在，是有一定进步的。但如果以科学著作的严格要求来看，坦率地讲，这部书的水平还很低，也存在不少缺点，基本上没有跳出苏联三十年代的老框框。周扬同志对这次在广州召开的讨论文艺概论教材会上提出的要求是：“解放思想，有所突破。”根据这个精神，会上不少同志指出，“这本书谈外部规律多，谈内部规律少，即对艺术本身的特点谈得很不够。”从

^{*}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举行的一次文艺理论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维诺格拉多夫，经过季摩菲耶夫，直到今天出版的许多文学概论，基本上都是小异而大同，几十年来在体系上仍然是墨守原来的框架，涉及到的文艺问题还是那些谈了又谈毫无新意的老问题。采用的范畴和概念也仍是十分贫乏的几乎人人熟悉的老一套。它们之间的差别，无非是在问题的罗列上作些调整，可以说是“新瓶装旧酒”。这些问题要谈起来就太多了。如毛泽东同志对文艺思想的贡献，我认为并不在五个“更”上，而是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把马列的革命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讲话发表以后，延安出现了大量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克服了以前革命文学模拟或抄袭苏联文艺创作的缺陷。例如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写农民爱土地就用西方式的与土地接吻，鲁迅杂文《刀“式”辩》也指的是这种情况。今天的开放政策对文艺是重要的，向人家学习不是坏事，但也要提防已经开始冒头的生搬硬套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倾向。二十年代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川端康成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以刊物《文艺时代》为中心形成一股新潮流，在三十年代初被我国作家穆时英、刘纳鸥等引进国内，一哄而起，可是曾几何时，它们就消失在忘川中了。今天谁还会去欣赏《白金女体的塑像》这类新感觉派的小说呢？但是那时它们几乎风行一时。这些经验不应忘记，我们不能让它重演。所以，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一点很必要。可是，现在的文学概论，并没有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融进内容中去。《文学的基本原理》也引用了古代文论的一些话，只是装饰性的点缀一下。中国古代文论中大量论述了想象问题，如《文赋》、《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以及后来的诗话词话等。但由于过去苏联这方面的著作不谈

想象，而我们的文艺概论也就不去碰它。今天不打破过去陈陈相因、固步自封的框子，文学概论是写不好的。再譬如情志，这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文艺作品通过自己的特点表达思想感情的概念。《文心雕龙》曾把文学作品比作有机体，以情志作为文学作品的灵魂。我国的古代文论向来主张明道说或载道说，直到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才出现了缘情说，刘勰则认为思想感情是互相渗透的，是融合在一起的。国外，黑格尔也谈到情志，他是借用古代希腊人的用语，这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纯理性的东西，而是被思想所提高的感情，被感情所深化的思想。情志就是这两种因素互相渗透所形成的，它充塞渗透在人的全部心情中，情志的英文译名是Pathos，黑格尔《美学》中译本译为情致绵绵的“情致”，也有人译为激情，动情力。但我觉得译为情志最为惬意，而且与我国古代文论的情志意义相近。我国的文论与西方的文论双方没有接触，当时也没有交流，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概念呢？这说明最普遍最根本的艺术概念以至规律是相通的。总之，要打破过去的框架，善于吸取我们已有的文艺科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理论的成果，创立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是当前文艺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不要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精髓，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时，有时也有偏差，就是用功利主义观点对基础理论一概加以抹煞，全都斥之为脱离实际。这是多年来轻视基础理论的后果。黑格尔曾批判过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在《小逻辑》里批判了一种观点：即理论研究必须立即产生实

用价值，否则就把它说成是空疏无用的学究把戏。他曾举出当时有些著作不去探讨事物的自身性质，只是把它们作为工具去实现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比如不去探讨橡树自身的性质，只是去考量橡树皮如何可以剥下来作为木塞以实现其封酒瓶的实用目的。黑格尔嘲笑说：“曾有不少书是根据这种作风写成的。”这种急功近利的观点在我们这里也很流行，我们往往很不适当地对德国人具有特色的理论表述作出了种种苛求和挑剔。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家例如康德的风格非常坏，因为他们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很抽象，很晦涩，是从概念到概念。我不同意这种批评，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粗暴和简单化。德国古典哲学遭到几次殃，斯大林就曾经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这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的恰恰相反。恩格斯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为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最早发现这些积极因素的是海涅，他从当时那些表面看来迂腐而晦涩的哲学中，发现了隐藏着的革命意义，他甚至把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比拟作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偏见的。否则我们怎么能说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呢？不错，黑格尔的哲学是晦涩的，马、恩都这样说过，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它是抽象朦胧的。它的晦涩主要是黑格尔体系造成的。他的体系严格遵循自在——自为——自在自为这三段式。而且把它毫无例外地用在每个小章节中。黑格尔哲学显得晦涩，就因为他在论述时，为了迁就这种刻板的先验的体系，往往不得不抛开事实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强制的人工手段，因此往往在一个环节向另一环节过渡时，就用了十分牵强以至神秘的说法，来维持他的体系的完整。不过在其他方面，黑格尔